

【论 文】

中国两次国学运动中的大小国学之争

励 轩¹

摘要：本文探讨了晚清以来两次国学运动中出现的“大小国学”之争，运用族裔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理论来说明坚持“小国学”理念实质是狭隘族裔中心主义行为，不利于国学运动的发展和“中国认同”的塑造，提出坚持“大国学”理念将有助于克服此次国学复兴运动中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大国学、小国学、族裔中心主义、跨学科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 2010 年对大陆高校相继建立的国学院提出了一个质疑：“国内有一些大学里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但是如果在这些‘国学研究院’里只讲授汉语文流传下来的典籍和学问，那么这个‘国’字也还是可以斟酌的，也许更名为‘汉学研究院’更加名副其实。”虽然并不是所有大陆国学院都是“汉学院”，但就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国学院确实办成了“汉学院”。马戎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新中国民族政策实施以来所造成的汉族-少数民族制度性区隔。² 笔者在本文探索了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两次倡导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和社会运动，即清末至民国 1930 年代的国学运动和 1990 年代以来的国学复兴运动。提出汉族—少数民族的文化区隔现象并不仅存在于目前的国学复兴运动中，也存在于新中国之前的国学运动。造成这种区隔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新中国族群区隔化的民族政策，部分也是由于倡导国学运动的知识分子有意或无意抱有狭隘族裔中心主义。同时，笔者也认为并不是所有国学运动中的参与者都抱有狭隘族裔中心主义，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构建一个更为包容的国学。进而归纳出了两次国学运动中的大小国学之争，提出了小国学理念背后蕴含的狭隘族裔中心主义，探讨了大国学理念如何帮助打破汉族—少数民族文化区隔以及如何有助于克服国学复兴运动发展所面临的其他挑战，认为中国学术界应该在这次国学复兴运动中坚持大国学理念。

国学概念的产生

国学一词，虽然古已有之，然而本初的意思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相去甚远。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里“国有学”指的是一国都城中所设教授贵胄子弟的学校。国学的这一含义直到二千多年后的清末还是如此。康有为在 1886 年所撰《教学通义》便说：“至于国学，自天子、世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教之……大学者，国学之大者也。古者家

¹ 作者为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候选人。

² 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 5 月。



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而国学有二：有大学，有小学。其地，则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

而具有现代含义的国学则可能跟中国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汇一样，来自日本。¹日本江户幕府时代的僧人契冲（公元1640~1701）从研究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出发，开启国学革新运动，与之同时代的神官荷田春满（1669~1736）继续对《万叶集》和其他日本古典作品的研究，并提出以日本古语、古文阐明日本固有精神，反对以儒学、佛学来解释日本古代典籍。其后学者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继续秉承这一思想，并身体力行进行日本国学研究。虽然参与国学革新运动不少日本学者都认同国学是日本固有文化与学术，但具体而言，又有所区别。比如契冲以之为“歌学”；荷田春满认为其范围包括国史、法制、歌学、语学；加茂真渊则认为应是国史、国语、国文、法制、故实。日本国学革新运动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学极有可能借助中国留日学者学生而被借入中国。²

由于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而避难日本的中国政治活动家、学者梁启超在1902年致函曾充任驻日外交官的学者黄遵宪，提出创立《国学报》，黄遵宪回信：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³在他们的对话中，隐约可以看出，梁、黄二人受日本影响以国粹指称国学，这已与国学旧义完全不同。此后，倡导成立国学保存会的学者黄节进一步明确自己提出国粹保存主义深受日本影响：“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者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量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倡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⁴1904年，青年学者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支持黄节的保存国粹的主张，并将国粹之名换成国学。⁵同年，黄节、邓实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⁶在国学保存会成立后两年，一批围绕在章太炎周围的留日学者学生在日本成立了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在发起书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⁷倡导国学运动。

与日本早期国学家对国学的定义有分歧一样，中国国学运动早期发起者们之间对国学的定义也有所不同。邓实黄节认为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这个意义就其范围而言更接近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可以称之为大国学。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⁸黄节说：“夫国学者，明吾国界，以定吾学界者也。”⁹然而章太炎似乎更偏向于将国学定义为汉人之学，其范围更接近于美国学术背景下的汉学（Sinology），可以称之为小国学。¹⁰他提出：“为甚提倡国粹¹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

¹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杨思信，《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博士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1999.11。

² 姜义华，“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学术月刊》，2007年7月。

³ 黄公度，“致饮冰室主人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⁴ 黄纯熙，“国粹保存主义”，载《政艺通报》壬寅第22期（1902-12-30）。

⁵ 邓实，“国学保存论”，载《政艺通报》，甲辰第3号（1904-03）。

⁶ 《国学保存会简章》，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

⁷ 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载《民报》第7号（1906-09）。

⁸ 邓实，“国学讲学记”，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7号。

⁹ 黄节，“《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

¹⁰ 章氏此后还在国学运动引入了另一术语国故，将文字、音韵、训诂、诗赋、诸子学等纳入其中。

¹¹ 虽然国粹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国文化的精华部分，而国学则是中性的词汇，但是中国最早一批国学运动提倡者似乎常常将二者混用。



以说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¹ 邓实、黄节和章太炎对国学定义的不同，在此后的国学运动中进一步激化，以致在民国学界还产生了国学是否该存在的争论。

大小国学之争

虽然邓实、黄节和章太炎等人对国学进行了初步的定义，但是他们的定义却非常笼统。邓实、黄节说国学为一国所有之学，然而到底什么才算一国所有之学，其研究方法应该是什么，他们并未给出非常可信的阐释。章太炎虽然比起邓实、黄节前进一步，提出了稍微明确国学研究范围，但对于应采用哪些研究方法，仍然语焉不详。他们有时也常将国学、国粹、国故混用，未作具体区分。

晚晴国学运动早期发起者对国学定义的不完善给了后来人以更多的发挥空间。如学者柳诒徵认为：“予对国学之界说，必非佛学及洋学，……须从古先圣贤，未受佛学洋学之熏染时讲清，而又包括后来之汉学、宋学，以及今世所讲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教育等，始可言国学。”² 可见，他似乎将学问是否是汉人所创作为界定国学的标准，非源自汉人的学问即使是佛学都要被摈除在外，对于时限，柳诒徵倒不在乎。学者蒙文通将国学范围缩小到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他称“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³ 史学家顾颉刚则认为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⁴ 甚至还有人认为：“国学者，（中）国文学而已。”⁵ 以上这些定义或是将国学局限于汉人之学，或是将之局限于一科之学，均不出小国学的范围。

与柳诒徵等人不同，民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办的国学门坚持大国学的主张。北大国学门称：“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⁶ 清华《研究院章程》则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⁷ 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更是称：“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⁸ 按照吴宓的理念，大国学不仅其研究范围要突破汉文化的藩篱，就连研究方法上都要突破义理词章考据。

吴宓发展邓实、黄节的大国学观点，还得到了当时不少学者的认同。语言学家郑奠认为：“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⁹ 学者胡适借用毛子水的国故学术语，也给国学做了一个定义：“‘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¹⁰ 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¹¹ 蔡尚思也明确提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

¹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民报》第6号（1906-07）。

² 柳诒徵，“国学之界说”，《柳诒徵说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7页。

³ 蒙文通，“经学导言”、“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成都：巴蜀书社，1995.12。

⁴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⁵ 邵祖平，“序”，《国学导读》，商务印书馆，1947年。

⁶ 《公布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布告》，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⁷ 《研究院章程·缘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6页。

⁸ 吴宓，“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

⁹ 郑奠，“国学研究方法总论”，洪北平编《国学研究》，上海民智书店，1930年，第3页。

¹⁰ 对于胡适将国故学省称国学，不少学者并不同意。参见罗志田，“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¹¹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第6页。



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¹ 有学者更是坦言：“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²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质疑国学存在的必要。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说：“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据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³ 报人曹聚仁也明确提出了反对国学一说：“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⁴ 有留洋背景的傅斯年在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坦言：“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祥，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⁵

如果说柳诒徵、吴宓、胡适等人对国学定义的争论乃是因邓实、黄节、章太炎对该词定义的不完备所致，陈独秀等人对国学的否定可能是受到新文化的影响。袁世凯当政时期在中国大力推行尊孔崇儒政策遭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感。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批评尊孔崇儒。而国学定义虽各家有争论，但大部分人都肯定将儒学纳入国学范畴，自然也就列入批判之列。此外，欧美学科划分体系也可能使受其影响的学者起来否定国学。毕竟，欧美大学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学科里面，文史哲政经农工商数理化各科分得很清楚，国学并无立锥之地，更无法与这些学科并列。

民国时期学界大小国学的争论，随着1930年代国学运动的衰歇而渐渐熄灭，而北大清华国学门以及在国学运动中相继产生各大高校国学院纷纷关闭或改名。此后，国学运动便沉寂了半个多世纪。

争论再起

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的数次政治运动以及之后的十年文革，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受到人为压制，传统文化也遭摧残，用于指称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国学被人们遗忘。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十年，经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得以呼吸一口外面的空气，知识分子便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中国之外特别是西方社会。然而1980年代末的政治事变，给中国的开放造成了不少阴影。这极有可能促成不少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自己，特别是原先被批判的传统文化，进而促成1990年代以来的国学复兴运动。

与清末和民国时期学界对国学定义存在争议一样，在这场国学复兴运动中，同样也出现了大小国学之争。有部分学者将国学限定为汉文化甚至是四部之学，如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毓庆说：“国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载体，国学分经、史、子、集四科。”⁶ 又比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贾松青声称：“儒学是国学的主体和精魂。”⁷ 成立于2010年的武汉大学国学院，在其本科生

¹ 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第5页。

² 《北大出版之两种季刊与史学》，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编《史地学报》第2卷第4号，1923年6月。

³ 陈独秀，“寸铁·国学”，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6-517页。

⁴ 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册，上海书店，1991年（据群学社1927年）影印，第92-93页。

⁵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

⁶ 刘毓庆，“国学的基本素质及其当代意义”，《山西大学学报》2006.06。

⁷ 贾松青，“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社会科学研究》2006.6。



培养方案中，所设课程几乎都不出四部学之外。¹ 小国学理念在普通民众中更是有不少有意或无意的支持者，他们往往将《论语》、《孟子》等传统汉文化中的典籍等同于国学内容，以为阅读这些典籍便是在复兴国学了。

在中国学术界，还有一批学者承袭吴宓等人的大国学理念，即突破汉文化的界限，将国学放宽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层面上去。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季羨林认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立文说：“国学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之学，不能仅看作是汉民族之学，也是全世界华人之学。国学不是民族中心主义，不是排外之学，而是容外之学；不是闭门之学，而是开放之学，不是固守之学，而是发展之学。”³成立于200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时秉承了这一理念。在国学院的专业方向和课程设置中，不仅包括了传统四部学，也涉及到了藏学、蒙古学、西域研究等学科，学生甚至有机会学习藏文、满文、梵文等文字。

除了大小国学之分，不少学者或机构也会将二者混淆，即表面上谈大国学，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小国学。江西城市职业学院讲师唐丽莉及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徐佩瑛在他们的论文《国学的当代思考及其传承路径》开头称：“国学，顾名思义，是中国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然后，接下来他们通篇只是谈儒家经典中几个名词。⁴在中国最大的国学门户网站国学网解释什么是国学时，先称：“‘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它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旁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但又称：“国学的分类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它把国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另一种是按内容分类，开始分为三类：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也就是哲学；考据之学，从事历史研究，也就是史学；辞章之学，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就是文学，及今天所说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⁵这种将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的现象并非鲜见，在许多汉人中，几乎已成定式思维。

1990年代以来国学复兴运动与晚清民国的国学运动有极相似之处，甚至这场国学复兴运动中也出现了对国学的广泛质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梦溪援引民国学者马一浮的观点，认为：“国学这一概念，是当我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应时而生的一个特指名词，是‘一时代的名词’（钱穆），是‘不甚恰当的名词’（马一浮）。如今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在扬榷古今、斟酌中西、权衡利弊之后，主张‘广义笼统’的‘国学’应该缓行、少行乃至不行，庶几不至于有背统趋新之嫌罢。”⁶已故作家舒芜更是激烈反对国学复兴运动，他说：“从网上可以看到，许多人年纪不大，水平也谈不上，开口闭口大侃‘国学’，一张嘴就是我们的民族传统啊、‘国学’根基啊等等，其实也都是糊里糊涂、玄玄乎乎的，从没仔细想一想，这个‘国学’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货色，有哲学吗？有史学吗？有文学吗？有自然科学吗？等等，不能说没有吧？如果有，为什么不归到各门学科里面去呢？非得要说‘国学’不可呢？唯我看来，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所谓‘国学’，也就是指能够看懂一点古书，能够做一点古诗词，能够写两笔字而已吧，笼而统之的就这么点东西，实际上空洞得很。”⁷然而他们的质疑看起来并未超越傅斯年等人，刘梦溪并未提出新的见解，舒芜反对所用的理由一是国学内容都可划入传统学科划分中，二是国学被庸俗化。

¹《武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实施细则（草案）》武汉大学国学院<http://guoxue.whu.edu.cn/?p=90>

²《大国学》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4/15/c_1235003.htm

³张立文，“国学的度越与建构”，《理论视野》2007年第1期。

⁴唐丽莉、徐佩瑛，“国学的当代思考及其传承路径”，《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⁵《什么是“国学”》国学网 <http://www.guoxue.com/?p=219>

⁶刘梦溪，“‘国学’一名‘恐将不立’”，《青年教师》2008.08.11。

⁷舒芜，“‘国学’质疑”，《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



国学运动背景下的族裔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在探讨晚清民国国学运动兴起的原因时，将之归结为抵制西方列强文化入侵的西方威胁论极为流行，不仅早期发起者黄节赞同“欧化主义浩浩滔天”，后世学者也对此观点也大力支持。¹然而西方威胁论却不能解释为何民国 1920 年代欧美列强对中国威胁退去的情况下，国学运动却蓬勃发展，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何在没有亡国危机的当下，却再次兴起了国学复兴运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另一个概念——族裔中心主义来解释国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族裔中心主义是美国耶鲁大学首位社会学教授 William Graham Sumner 提出的，指的是人们看待事务以自己所在群体为中心，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所有他者。Sumner 进一步认为，族裔中心主义往往导致人们为自己所在群体产生优越感，并轻视外来者。²族裔中心主义并不一定是负面，只要有一个他者的产生，便极有可能导致族裔中心主义行为的出现，尽管通常情况下，族裔中心主义行为并不意在损害他者。

产生族裔中心主义行为所需要的他者，既可以是真实面对的，也可以是想象出来的。晚清中国学界所处的局面便是面临一个强大的他者——西学。尽管这个西学也存在着想象成分，连西方人都未必承认此术语，却在中国极为流行。早在国学运动产生之前，张之洞在其 1898 年发表的《劝学篇》中即已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很好的制造了自我和他者的对立，虽然何谓中学，何谓西学很难进行严格的定义。但这种将中学和西学对立的思维，似乎给了国学运动早期发起者以启发，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若不是因为日本的影响，国学运动要改成中学运动了。

这种自我和他者的话语一直伴随着两次国学运动，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字学家胡朴安说：“国学二字，作如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³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也常常将“国学”与“外学”相对举。1990 年以来国学复兴运动中大国学的积极倡导者季羨林先生称：“要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目的绝不是自吹自擂，而是为了全世界文化的发展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教授在国学院官方网站的致辞中提出：“（国学院）成功做到了立足本土、面向世界。”⁵

而当自我和他者的边界模糊之后，国学运动似乎也走入衰落。1930 年代，随着中国各所西式大学学科设置渐趋完备，国学内容被纳入到各个西式学科中，国学和西学的边界也分不清了，国学运动也就衰落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中国和欧美之间遭到人为隔绝，1978 年改革开放后，经历长期封闭的自我突然又遇到了一个他者，一时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立话语再次成为时髦，同时近三十年的封闭又使得中国大学学术体系与欧美的脱节，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突然发现如何在现有学科体系内容纳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又出现一定难度⁶，这成为国学运动不仅在

¹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 年第 5 期；杨思信，《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博士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1999.11 第 61 页；林藟，“‘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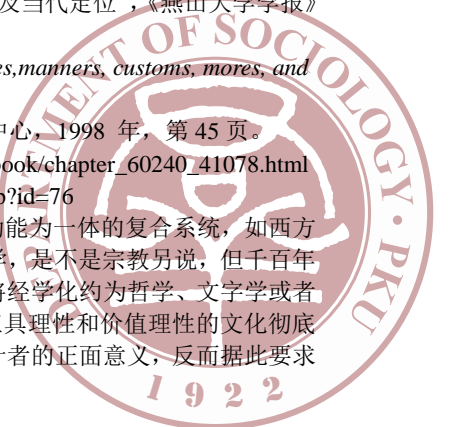
² Sumner, William Graham.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Boston: Ginn and Co., 1906) P13

³ 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第 45 页。

⁴ 季羨林，“21 世纪国学研究瞻望”《谈国学》 新浪网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60240_41078.html

⁵ 黄朴民《院长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http://guoxue.ruc.edu.cn/xygk_more.asp?id=76

⁶ 陈明：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文化，其整体上乃是一个集应物、治事、立命安身诸功能为一体的复合系统，如西方文化就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宗教神学三足鼎立支撑。经史子集之经，即儒学，是不是宗教另说，但千百年来主要是由它作为民族生命之意义提供者、作为文化认同之标志则毋庸置疑。将经学化约为哲学、文字学或者历史学、人类学，结果是造成方法的错乱、意义的遮蔽。方法错乱就是将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文化彻底对象化知识化；意义遮蔽就是无视儒学作为民族性格之塑造者、国家理想之设计者的正面意义，反而据此要求



普通大众甚至在学术界能够再次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国学理念中的狭隘族裔中心主义

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尽管会带来温和的族裔中心主义，但并非所有的族裔中心主义都是温和的，他们的对立也可能发展成极端的狭隘族裔中心主义。考察中国的两次国学运动，很容易发现这种狭隘族裔中心主义行为：即汉族知识分子排斥少数民族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

国学运动的发端便离不开汉人知识分子的狭隘族裔中心主义，其早期发起者们将国学运动视为排满的一种方式。作为发起者之一的章太炎，不仅是学者，更是革命家，他本人曾有浓厚排满倾向，1906年他在日本的演说时称要“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¹此处的种姓显然指的是汉人，这里的国也就是汉人的国，国粹则是指汉人的文化，他的演说暗示了发起国学运动乃是要动员汉人去排满反清。章太炎显然把汉人当作一个自我，将满人当作他者，言下之意，只有汉人的文化才能称为国粹，而少数民族文化进不了这个国粹的范围。受到当时反清革命的影响，不仅章太炎，甚至抱有原始大国学观念的邓实、黄节也是排满分子，他们在自己所办《国粹学报》上倡言排满。

辛亥革命的完成，使得政治上反清排满的任务也终结，反映在文化上的，便是民国国学运动极少出现反对少数民族的言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族学者们不再将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到国学之外。小国学的倡导者自不必说，即使开明如胡适者，也难脱狭隘族裔中心主义的窠臼。他虽然认为研究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文化的学问便是国学，但当他应邀为清华学生推荐国学书目时，其所开列的190本书中，无一本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或研究著作。²另一位大学者，梁启超推荐的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26种，也未能超过四部之学。³当然，胡适、梁启超等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忽视极有可能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对这些文化缺乏了解，无论是胡适、梁启超还是钱穆等那个时候最有名气的大学者，都不会说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他们也极少有机会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领略那里的传统和文化。

不过，对少数民族文化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在1990年代国学复兴运动后的当下依旧广泛存在。虽然费孝通先生早在1988年便已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然而在许多普通民众眼中，中华文化依旧只是汉文化的另一个词而已，诸如将中华民族等同“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这类错误更是屡见报端。在学术界，对小国学理念实实在在的支持也不少，如某位教授所著的《国学通论》一书，各章分别是“儒学与经学、十三经、史部概论、二十五史、先秦诸子、历代子学、集部概论、古典文学概论、佛学概论、道教概论、古典艺术学、版本目录与校勘、文字音韵与训诂、天文地理学。”⁴若是细细去读各个章节，竟然找不到一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子。又比如某几位学者所著的《国学概要——对国学的文化解读》，把少数民族的文化一概省去了。成立于2011年的某高校国学院明确提出自己的研究生教育“将宋元史专题研究、明清史专题研究、近世制度史研究、近世学术史研究、儒学专题研究、佛道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术前沿、海外汉学研究设置专业主干课程与发展方向课程”⁵，而早于一年前成立的某高校国学院更是将自己的

其为我们近代世界性的殖民运动中遭受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国学院成立的期待与忧虑》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sid=108&id=16390>

¹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民报》第6号（1906-07）。

²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转引自国学网 <http://www.guoxue.com/discord/content/hs.htm>

³ 《五位国学大师开列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国学网 <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0751>

⁴ 曹胜高，《国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6。

⁵ 《中国史硕士学位——国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

<http://gxy.hznu.edu.cn/jhpy/xjsjy/286395.shtml>



本科生课程限定在了四部学。

当然，直接说国学就是汉文化的学者还是比较少，狭隘族裔中心主义在目前学术界更多的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即肯定国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但又特别强调对汉文化的关注，特别是对儒学经学的关注。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是某位教授的观点，他说“我们讲国学。不能排斥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各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所谓‘三教九流’都应该包括在内。”¹可是他又说：“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我讲的是历史事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²按照这位教授的观点，包括众多少数族群文化在内的非儒学都算是次流或未流了。如果少数族群文化仅是次流或未流观点成立，那么从事这些文化研究的学者不该得到比儒学研究者更多的学术资源怕是也要成立了。

相较于小国学，国学复兴运动中的大国学理念和实践则较好避免了狭隘族裔中心主义。季羨林的大国学理念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沈卫荣教授的梦想，他和人大国学院的几位创始人一道将这个大国学梦想付诸实践。在他们的文化自我中，不仅包含了汉文化，也包含了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³因此，人大国学院不仅从事汉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从事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国学复兴运动的未来

1990年代以来的国学复兴运动依旧面临着晚晴民国国兴运动所要回答的两个拷问，一是如何取舍国学的定义，二是如何与现代大学学科体系融合。若采用小国学的理念，将国学等同于汉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那么少数民族的文化就不属于中国文化，若连自己的文化都不被承认为中国文化，少数民族人士怎么会对中国有认同感。若在大国学的形式下却提倡儒学或经学是中国文化主流，那么言下之意，其他文化在中国都是次流或未流，可是对于藏族人来说，藏传佛教文化才是主流，对于维吾尔人来说伊斯兰文化才是主流。倡导儒学经学主流说进而暗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必须懂点孔孟之道方能称中国人，既荒谬，也不利于中国认同的塑造。

而真正选择大国学理念不仅有助于强化中国认同，也与中国的现实相符合。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族群组成，每一个族群都拥有自己灿烂的历史和文化，藏族有自己的藏传佛教传统，蒙古族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大帝国，维吾尔族对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是各自族群的财富，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若肯定国学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那么少数民族文化自然是要包括在这里面的。

除了要在国学定义中进行取舍外，在国学复兴运动中还需要依照大国学理念谨慎处理相关术语的语言翻译。若不能将相关术语精确翻译，极有可能带来新的误解。比如目前流行的“国学”的翻译是 Chinese Classics，这里的 Chinese 是指“汉文的”还是“中国的”就存在歧义，如果仅指“汉文的”，那么就让人联想到国学仅指汉文典籍。这方面，我们也许可以借鉴日本学界的做法，他们采用 Japanese Studies 作为意指研究日本传统文化的国学，中国的国学不妨可以译成 Chinese Studies。又比如 Sinology 应该翻译成汉学还是中国学？在台湾，Sinology 等同于中国学。

¹ 李学勤，“我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北京日报》2009.10.23

² 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光明网。

http://www.gmw.cn/01ds/2010-08/04/content_1203462.htm

³ 张越，“沈卫荣的大国学梦想”，《中关村》2012年第1期。



中国研究 (Chinese Studies)，而在美国学术背景下，Sinology 仅指对古汉语、汉文经典、哲学方法的研究。显然，大陆学术界可以采用美国的 Sinology 定义，称汉文化研究为汉学。如此一来，国学相关英文术语也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学 (Chinese Studies)，汉学 (Sinology)，藏学 (Tibetan Studies/Tibetology)，蒙古学 (Mongolian Studies)，维吾尔学 (Uyghur Studies)，以此类推。但以上术语译介体系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即无论是 Chinese Studies 还是 Tibetan Studies，都不排斥现当代研究，这与研究传统中国学术和文化中的传统二字有冲突。要解决这一个冲突，笔者认为比较妥当的办法是拓展国学的疆界到现当代，一来，中国文化发展本来就是连续的，按照时间来割裂这种文化的连续性本来就不妥当，二是，疆界的拓展也可以给研究机构里的相关学者们更多的研究空间。

相比翻译等技术问题，目前国学复兴运动所面临的更大挑战应该是如何与现代大学学科体系融合。人文社会科学文史哲政经社划分方法确实让国学面临一个很大的尴尬，国学内容似乎都可以被以上学科所纳入，而且国学研究方法也难突破以上学科既有方法。正是因为民国西式大学学科渐趋完备，促成了国学和西学这种自我和他者疆界的模糊甚至消失，熄灭了晚清以来的国学运动。就世界范围来看，极少有国家将本国国学列为与文史哲并列的学科，作为中国曾经的老师，日本各大学甚至连专门的国学研究和教育机构也不存在。美国许多大学也并无 Department of American Studies，他们更普遍的做法是在各学科内再细分地区研究，历史系有美国历史，政治系有美国政治，以此将美国研究纳入到各个学科。这当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而且中国大学目前比较通行的办法确实也是如此。只是这也意味着，国学复兴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国学院似乎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

如果要让国学院继续存在下去，只有按照吴宓大国学理念中的跨学科思维，突破文史哲政经社的学科划分，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在这里，美国大学设置地区研究系的做法也许值得参考。目前美国多所大学均在地区研究系的设置上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印第安纳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地区研究系包括美国研究系 (Department of American Studies)、东亚语言和文化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中欧亚研究系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中东语言和文化系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斯拉夫语言和文化系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¹这些地区研究系都是跨学科系，意味着教授和学生不必局限于单一学科研究方法，而可以依照自己所需来选用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如中欧亚研究系学生就可以选择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或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系所设置促进了印第安纳大学相关地区研究的学术发展，作为美国一所普通公立大学，竟然涌现出了 Denis Sinor、Gyorgy Kara、Christopher Beckwith 等中欧亚研究领域的世界级权威。

在此次国学复兴运动中，如果大陆高校国学院学习美国高校相关系所，将自己定位为跨学科的地区研究机构，带来的好处将是显而易见。首先，有助于推动中国认同的构建。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中国的文化是由五十六族群的文化共同构成的。然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语言长期以来被主流中国社会边缘化，对他们的研究往往只集中在几所民族高校，从而形成文化上的汉族-少数民族区隔。而将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等纳入国学院的专业方向设置中来，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语言获得汉人社会的肯定，打破文化区隔，促进少数民族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利于多族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其次，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汉文化的认识。中国数千年历史不是各族群相互独立的历史，而是各族群相互交融、碰撞的历史。在相互交融、碰撞的过程中，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比如丝绸之路的形成，就是汉族和西域各少数民族共同努力的成果。

¹ 印第安纳大学 <http://www.iub.edu/academic/departments/index.shtml>



研究丝绸之路不仅仅有助于了解这条路上曾出现过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互动的。又比如研究西夏黑水城文书，不仅可以了解西夏人当时的语言文字、律法、宗教情况，也有助于明白汉文化是如何影响当时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

其次，有助于保存少数民族文化。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科技进步，中国民族融合的步伐显然已经加快。然而在民族融合加快的同时，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却也面临着危机，一些人口稀少的族群如锡伯族，自己的语言将丢失。国学院招募学者从事这些文化研究，无异于是在挽救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借助国学院研究人员，普通大众也将有更多机会知道中国不只有孔孟老庄，还有宗喀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也不只有四书五经，还有萨迦格言，从而使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能够在更多人心目中长存。

再次，有助于打破国内高校僵化的院系学科设置体制。当我国大陆高校还在固守传统文史哲政经社学科体制时，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尽管他们还保留传统的文史哲政经社学科，但大量高校设置了不少跨学科系所，从而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国学院吸纳多学科人才，允许师生用跨学科方法从事研究，将是改革我国传统学科体制的开始。

最后，有助于教授和学生利用跨学科优势推进学术研究。摆脱传统学科体制束缚的师生，可以尝试用不同视角和方法去看待和研究问题。比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引入统计学方法、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新方法和理论的引入，将对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带来革命性变化，促使我国学术界尽快与西方发达国家高校跨学科学术研究趋势接轨。

总结

大国学理念不仅是指研究范围的扩大，也是指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认同，在中国学术界实践大国学理念，不仅能够使得相关研究单位和机构人员能够从更大范围搜寻自己的研究兴趣，而且也便于他们采用跨学科方法来帮助自己研究。此外，实践大国学理念更有助于保存少数民族传统和文化，也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加深对对方传统和文化的理解，打破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增进中国认同的塑造。小国学理念在研究范围和方法都比较狭窄，且易强化汉族——少数民族的文化区隔，不利于中国认同的塑造。因此，在这一次的国学复兴运动中，中国学术界应该坚持大国学理念。

